

編者按

90年代以來，批判激進主義和從負面價值評價「五四」，成為大陸學術界「五四」研究中引人注目的新取向。這對於過去那種從單一革命史角度全盤肯定「五四」的僵化模式，無疑是一種突破。但是，這種作法同樣也不能真實地呈現「五四」多元、開放的內涵和精神。本期「五四回顧：人物與歷史」五篇文章，多少顯示了「五四」研究仍有待發掘的豐富內涵。

歐陽哲生梳理了胡適在不同時期評價「五四」的言論，發現胡適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有完全不同於革命話語和傳統主義的評價和闡釋。事實上，自由主義曾在新文化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只是在20、30年代以後才受到意識形態的壓制。此外，杜鋼建專題評介陳獨秀論集體人權觀和高力克論杜亞泉的中西文化觀兩篇文章，不僅使我們更深入了解陳獨秀、杜亞泉的觀點，而且讓我們看到在「五四」時代這兩位分別代表激進馬列主義和文化保守調合論的學者並非勢不兩立、水火不融；相反，他們都持開放式的學者立場。最後，周繼旨論「聖王合一」對馮友蘭的影響，以及呂文浩論議政型自由主義學者潘光旦，都很有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時期馮、潘二人均為在校學生，又都是二十世紀開創中國新學科的重要學者，而以往的「五四」研究中，比較忽略那些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尚在求學而後又與政治保持或遠或近距離的學者類型。